

● 中国历史

论 20 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顾 莹 惠

(苏州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作者简介] 顾莹惠(1953-), 女, 江苏苏州人, 苏州大学人文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研究。

[摘 要] 国民外交源于人民主权思想, 是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 谋求国家发展, 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的对外交涉和交流。20 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勃兴, 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20 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有着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和多种活动方式并行的鲜明时代特点, 并且因其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而呈现出多种特殊历史作用。

[关键词] 20 世纪初; 中国; 国民外交

[中图分类号] K 25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4-0409-08

20 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义倡行的时代, 也是近代中国国民外交全面启动之时。面对国家民族的深重危机, 日益觉醒的中国各派力量, 纷纷呼吁国民关注外交事件, 鼓励国民自立反抗, 宣传国民参与外交, 以“保有自主权, 不受凌侮劫夺”^[1](第 74 页)。虽然, 各派的政治主张不一, 要求变革社会的方式各异, 所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也不尽相同, 但是, 在对国民外交的基本认识上却颇为一致, 即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必须依靠国民自身的力量, 国民必须直接参与或影响关系国家命运的外交事务, 才能挽回利权并阻止清政府出卖国家利益。正是本着对“外交事件, 人民得参与其间”的认识^[2](第 7 页), 中国各派力量开始以各种方式进行国民外交活动, 从而开创了 20 世纪初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刚跨入新世纪的今天, 对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 做一番较为深入的考察研究, 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中将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国民外交是指民族国家兴起以来, 各国国民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权利, 谋求国家发展, 争取世界和平而以非官方的身份从事的对外交涉和交流。它又被称作人民外交、民众外交、民间外交、公众外交等等。国民外交源于“人民主权”思想, 即主权是公意的运用, 是国家的灵魂, 集体的生命, 主权属于人民, 国家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国际事务不仅仅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 而且是直接影响本国和世界人民的事情。因此, 国民应该直接参与外交事务, 或监督本国政府机构的外交活动。国民外交是“主权在民”原则在外交领域里的具体体现。

中国的国民外交源自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近代国民思想的兴起与民族国家观念

* 收稿日期: 2002-01-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项目(96075010)

的更新,可以说,既是“外邦逼之,异种残之”的产物,又是“西学东渐”、“规抚欧美经验”的产物。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天朝大国”沦落为一个无独立完整主权的“世界大公国”,原本“诸番入贡,华夷一统”的格局,已被“强邻环列”、“瓜分豆剖”之危局所取代。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战则丧师失地,和则赔款损权,“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正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天赋人权学说与民族自决思想,认识到“国民不知国家学,则无爱国心;国民不知国际法,则无真爱国心”,认识到国家之前途全在于国民之责任心^[3](第823页)。这正如列宁所言:“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起了民族主义,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4](第424页)因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中国民众认识到必须奋起自救。因奋起自救,中国民众又进而认识到自身在国家中的应有之地位。国家危亡,唤起了人们的国民意识;救亡图存,催发了人们的国民外交思想。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为目标,却以纯粹国民身份开展外交活动的实践者。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就学的经历,不仅使他在学生时期就早已“始知世界大势,发生国家观念”,进而“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5](第59页),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之主张,而且使他与众多外国朋友和爱国华侨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从而疏通了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最初渠道。19世纪末,孙中山就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革命为求民族独立,革命为兴人民主权。为了谋求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联结四方贤才志士”,孙中山频繁奔走于海外各国,进行着多种形式的国民外交活动。

到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全面启动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首先,在思想舆论界,宣传鼓吹人民主权思想与民族独立思想已蔚为风气。各种报刊杂志均大量刊登了鼓吹国民思想与民族独立之文章。当时“执舆论界牛耳”之梁启超,也公开鼓吹:“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6](第32页)在《新民说》中,他又开宗明义地指出:“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其立论之根柢有二:一曰关于内治者,二曰关于外交者”,强调“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7](第118页)。可以说,在思想舆论界的鼓吹中,民族、民权思想已浑然一体不可分,国家主权要靠有责任心的国民去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国民自决去争取。

而且,大多数思想舆论界人士均反对暴力排外,认为“其结果乃至丧利失权,外力日迫”^[3](第1069页),主张采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有的则提出“文明排外”之口号,指出:“排外之道,当以精神不当以形迹。排以精神者,内则自修其政治,自整其武备,自固其民志,时时存独立不羁之意。而对于外,则礼貌有加,仪节不失,虽深仇夙怨之国,亦往来酬应,无异于姻娅。”^[3](第621页)正是为引导国民形成正确的外交观念,采用合法手段,维护国家利益,中国第一份民办的专门性的《外交报》于1902年1月4日应运而生。蔡元培在创刊号中,明确阐述了该报宗旨为:“荟我国自治之节度、外交之政策,与外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胪举而博译之,将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为理论家邮传,而为实际家前驱。”当时,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均辟有外交专栏,发表外交时论,介绍各国概况,用以普及国民外交知识,争取公众外交舆论。

其次,是各种有影响力、号召力的民间组织已经出现,为国民外交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海外联系网络。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在革命小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原兴中会在香港、东南亚、北美、欧洲各地的多处分支机构,也得以进一步扩大与健全,其设在日本东京的总部,与在海内外各处陆续建立的45处分支机构,自然形成了一个联系广泛的组织网络。康有为、梁启超自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后,于1899年7月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了“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在北南美洲、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建立了总会、支会100多个,会员近100人。20世纪初的中国商人也已成立了商会组织,自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至1906年后,全国的商会组织已形成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三级体制,遍及各大商埠州县村镇,而且海外的中华总商会也纷纷成立。自1897年在日本的华商总商会成立后,1904年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纽约的中华总商会相继成立,

1906~1909年,新加坡和日本的长崎、横滨、大阪,以及缅甸、泰国和加拿大温哥华等处的中华总商会也先后成立^[7](第18页)。商人团体也形成了一个联系广泛的组织网络。

再次,20世纪初清政府先后出台的各种“新政”措施,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开放度,为中国国民的自主外交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当时的清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对外不能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对内朝廷权威日渐衰落。为了消弭革命、缓和矛盾而实施的各项“新政”,则又在客观上为中国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奖励实业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大大提高了民间商人的社会地位,也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商人的经营范围与对外交流渠道;废科举、派留学生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又使得国内新式教育盛行,出国留学热潮高涨,学界的各种交流活动范围也随之大为拓展,影响力与日俱增;军制的改革,又造就了一大批易于接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新军士兵;预备立宪的宣布,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士绅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意识……。随着中国社会新兴力量的不断成长,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却在不断减弱,国民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强,各领域代表人物的号召力也在不断提高,民间组织要求参与外交事务,自主组织开展对外交往,也就日益成为可能。弱政府的现实,是在逼迫中国民众不得不奋起自救的同时,又为中国国民的自主外交客观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上情况清楚地表明,20世纪初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状况的急剧变化与发展,从而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国民权利思想与民族自决精神。思想舆论界的宣传鼓吹,为国民关注外交事件、参与外交事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各级各类民间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为国民直接参与和开展各种外交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与联系网络;中国学界人士的大批走向世界,商界投资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则又大大拓宽了中外交流合作的渠道。事实表明,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勃兴,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的。

二

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是与当时中国主要的政治派别和社会力量的活动紧密联系的。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三派力量、五种方式。三派力量是: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为反清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在海外开展的各种外交活动;二是流亡海外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为谋求各国支持中国的保皇改良运动而进行的各种外交活动;三是由实业家结成的商会力量,为振兴实业、发展商务、改变“利权尽在洋商之手”局面,而组织开展的各种外交活动。五种方式是:一是通过直接与外国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商谈,以谋求外国援助或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二是通过与一些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某种私人关系,从而间接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三是通过广泛的舆论宣传活动,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四是通过组织发动一定规模的民众运动,并采取相应的抵制措施,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与对外交涉,迫使他国政府修正对华政策措施;五是通过出国参会、访问,或是接待来访等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正常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等。

20世纪初革命派的国民外交活动是以孙中山为核心的。1896年10月,英国伦敦蒙难的经历,不仅使孙中山开始形成对西方国家开展国民外交的基本思路,而且使孙中山成为了一个有较高知名度的国际性人物。在这一事件中,孙中山切身体验了西方国家公众舆论对于政府决策的巨大影响力。当时围绕着营救孙中山一事,先后卷入的有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孟生博士,有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和工人柯尔、英国报界、英国内政部、外交部、苏格兰警署,乃至英国首相兼外长沙士勃雷侯爵。报界的报道,使英国公众的同情心倾向于孙中山一边,从而深刻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英国首相明确表示清使馆拘留孙中山是违反外交特权的,英国外交部则明确要求清公使馆立即释放孙中山^[8](第107页)。这就使孙中山从此坚信,争取西方国家民众的支持,从而影响该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应是其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重点之一。这一事件也为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治主张的好机会。他通过会见各报记

者,出席演讲会,出版《伦敦被难记》,在《双周评论》、《东亚季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用西方人普遍能接受的方式,尽力宣传他的革命主张^[9](第36页)。这就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伴随着他的名字在海外流传开来,从而为他拓展国民外交渠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0世纪初革命派的国民外交活动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在世界各地建立舆论宣传基地,增强革命派的对外影响力,谋求各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舆论支持。当时,革命派在海外的报纸多达10来种,如香港的《中国日报》、日本东京的《民报》、檀香山的《檀山日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阳明日报》(Chay a Mata Hari)、《星洲晨报》、暹罗的《暹华日报》、美国旧金山的《大同日报》、《美洲少年》、《少年中国晨报》等等。而且,孙中山每到一地,必作演讲。在1902年至1905年、1907年至1910年,孙中山曾两次作过长时间、远距离的巡回演讲活动。历经南洋新加坡、越南、马来亚、暹罗各地,再经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各国,跨越大西洋,横贯美洲大陆,广泛进行了对外舆论宣传。以至有人撰文指出:“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而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逸仙而中国始可为。”^[5](第325页)足以见得革命派在海外的影响力了。二是通过广泛结交各国各界朋友并建立密切联系,以疏通各方外交渠道,影响外国对华政策。20世纪初与孙中山保持经常性密切联系的外国友人,已遍及各洲各国各界。其中,既有其早年求学时就有密切联系的学校教师、报刊记者、教会牧师、医界商界人士,又有开展革命活动后结识的剑桥大学汉学家、英国下院议员、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日本生物学家、自由主义政治家、美国作家、朝鲜志士、菲律宾革命者……。从政界要人、国会议员,到在野名流、各界领袖;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官员、驻外使节,到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志士、独立运动领导人;从学者、记者、思想家,到士兵、军官、工厂主……,几乎无一不包。通过这些联系,孙中山不仅广泛地获取了各种信息,疏通了各方渠道,而且直接间接地对各国政府施加了影响。三是通过直接与外国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接触,游说各国政府,寻求外交支持,募集资金援助。为了谋求发动武装起义的武器来源,争取各国政府对新政权的外交承认与财政援助,孙中山是常年奔走于海外。从筹备发动1895年的广州起义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孙中山曾多次拜会过日本的政府官员、驻外使节,德国驻香港领事,走访过法国驻日公使,与法国驻沪领事和驻广州领事联系过,在越南西贡见过法国越南总督保尔·韬美^[5](第215页),与法国首相克利孟梭、前外长毕盛、外交部官员拉法埃·罗·菲利浦·贝特洛、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德·马赛等人见过面,与美国驻暹罗公使Hamilton King会谈过,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写过信,曾委托马克沁机枪制造厂厂主道生面见过英国外务大臣格雷^[5](第576页),还与各国银行家会过面……。虽然,实质性的外交成果很难获得,但是,作为一个活跃的国民外交家,却是名副其实。

与革命派相比较,康、梁保皇派所进行的国民外交活动,是目的不同、方式相同,虽然康有为、梁启超在一段时间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还在革命派之上,但因其保皇目的与门户之见之制约,故保皇派在海内外掀起了两个较大的浪潮之后,便开始走向分化,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

第一个浪潮是反对清廷废立之事。1899年12月,清廷发生了西太后企图废黜光绪帝以端王载漪之子溥儀嗣位之事。保皇党人为保教光绪帝,四处奔走呼号,动员海内外舆论反对,并游说各国政要,谋求列强出面反对清廷废立之事。当时在海外的“发电者共四十六埠,一埠联名或多至八万人”^[10](第49页)。列强各国也纷纷表示反对,最后迫使西太后决定“改名新皇帝溥儀暂屈为大阿哥,入宫养育,承嗣穆宗,称今上曰皇叔”^[11](第194页),反对清廷废立之事取得了胜利。紧接着,保皇党人又掀起了第二个浪潮。1900年春夏,乘清廷在北方与列强对抗之机,发起“勤王”运动,筹备在长江流域举行自立军起义,拥立光绪皇帝复辟,并寻求列强支持,希图建立一个有英国保护的以两广为基地的“自立国”。起义总机关设在澳门,国内以上海为基地,海外则在日本、南洋、美洲各处,广募款项,联络会党,招募外国兵将。但是,起义尚未发动,清廷已向列强求和。列强为维护在华利益,也转而采取与清廷合作的态度。8月17日,英国驻武汉领事致函湖广总督张之洞,称:“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11](第247页)8月22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2人,“勤王”运动遂宣告失败。

“勤王”运动失败后,保皇党人虽然仍在海外各处奔走努力,但无奈革命风潮已是一日千丈,“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3](第607-608页)1907年3月23日,康有为在美国纽约将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以君主立宪、尊帝室、扩民权为宗旨^[10](第487-489页)。1908年光绪帝逝世后,康有为又将帝国宪政会改为“帝国统一党”。但保皇立宪已失却其吸引力与号召力,康有为也已被人称之为“过去人物”了。

与革命派和保皇派相比较,中国商界组织的国民外交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20世纪初的中国实业家群体,是一个较早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群体,也是一个对于“利权尽在洋商之手”最有切身体验的群体,就他们关注的问题来看,主要是与“商战”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权益。因此,目标较为具体实际,所开展的活动也往往能取得政府的某些支持,其优势在于可以立足本国带动海外,采用合法手段进行各种国民外交活动。

20世纪初的中国商界,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一是通过各种舆论宣传活动来宣传国货,拓展对外贸易渠道,影响官方的外交交涉与外交政策。当时的商界人士已明确认识到:“20世纪之世界,一全球相争相竞之世界也。竞争之目的,在求所以自存而达目的之方法。”^[12](第29页)因此,商界人士在鼓吹团结自主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还通过组织集会演讲、发表通电、致书海内外、散发宣传小册子、举办商品展览会、组织展品出国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等手段,来动员海内外舆论,宣传国货,抵制外货,参与国际贸易,以争商权、国权。二是充当官方对外交涉的咨询机构,间接参与外交谈判。20世纪初,各国依据《辛丑条约》中有关修订中外商约的规定,纷纷照会清政府,要求修订商约,以期扩大在华权益。1902年1月,中英商约谈判首先在上海开议。2月22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集合各业领袖20多人,直接为中英商约谈判出谋划策。虽然,中国商界并未能直接参与谈判,但最终在商约的“裁厘加税”条款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即在英方提出的“裁厘”要求上,加上了中方的具体“加税”要求,将原“值百抽五”的进口关税增至12.5%^[13](第107页)。依据“利益均沾”之原则,该条款还载入了1903年签订的《中美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之中。三是充当民间对外交涉员的角色,与外国官方进行直接接触交涉。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商务总会是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者。5月21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等8人,应美方之邀与美驻华公使柔克义、驻沪总领事劳治师等外交官员,就中美修约问题进行了直接接触。虽然,交涉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中方提出的删除《华工禁约》中之苛例、另订保护在美华侨华工权益之新约之要求,未能获得美方的合理答复。但是,这一直接对美交涉事件,却从此将商人团体置于各种民间对外交涉之前台。此后,凡遇处理租界内华洋纠纷,收回路矿利权之交涉,有关中外经济合作项目之交涉……,商人团体均充当了民间对外交涉员的角色。四是组织开展中外商会间的交往与合作。虽然,英国的商会组织在1768年就已出现,外商在华的洋商总会也于1847年就已上海成立,但中国的商会组织却是在1902年才成立。因此,中外商会交往在20世纪初还属于新生事物。1904年时,上海商务总会为租界内华洋商事纠纷,曾与在沪各国商会有过最初的接触。1910年,中国的商会组织开始正式接待外国来访的实业考察团。如果说5月来访的日本实业考察团,属于半官方性质,中国的商会组织还只是充当配角进行一些应景式的接待交流,那么,9月来访的美国实业考察团,则纯属民间性质,是由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城市商会代表联合组成。因此,中国商会组织已是接待交流的主角。美国考察团每到一地,必由商会组织接待,进行业务会谈,共商投资贸易问题,而且在考察结束时,双方还在上海专门举行了一场“中美商业联合研究会”,集合中国各地商会代表,与美方共同研讨有关中美民间经济合作事宜。会上还就成立中美商会联合会、并附设中美商品陈列所,创办中美银行与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达成了几个合作协议^[14](第10号)。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各派力量所实际从事的各种对外活动,已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国民外交活动。虽然他们还未正式以国民外交相标榜,而主要是以革命、保皇、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相号召,但他们实际进行的各种对外活动,就其基本目标而言,是为了提高国家地位、维护国家利益与国民权益;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已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就其活动方式而言,已运用了间接参与、直接交

涉等多种国民外交的基本方式。可以说,这些自主开展的对外活动,已经打上了十分明显的国民外交标记。

三

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虽然还刚处在全面启动的阶段,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特殊的历史作用,却能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社会各派力量在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更客观地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从而也能使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作为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具有三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各派新兴力量共同参与、多种活动方式并行、海内海外相呼应的特点。无论是革命派、保皇派,还是商会组织,几乎同时在各条战线采用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进行着国民外交活动,而且一处发动,各处响应,近则国内各城镇,远达东南亚各地、欧美各国。可以说,这是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主要特点,也是优点。

二是涉及面十分广泛,却未能出现一个全国统一的国民外交组织机构。各派力量营垒分明,虽在同时开展活动,但相互联系却很少,甚至还在互相攻击,致使有些对外主张基本一致的活动,也因门户之见而不能携手合作,故一方面是各派力量各种活动频繁开展,一方面却在矛盾分歧中相互削弱其影响与作用。这是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最大缺点。

三是舆论宣传声势虽大,实际参与人数却不多,影响力还主要局限在知识界范围内。无论是革命派、保皇派,还是商会组织,当时真正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的主要是少数领袖人物,而且就当时的活动开展与信息发布来看,也主要是在各大城市的租界里和海外各处进行,一般民众还未能真正参与进来。只有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因直接涉及人们的生活日用品,故参与面相对较为广泛。就一般活动而言,还未能真正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呼应。

这些特点充分反映出当时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各派新兴力量因其所受教育、所处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虽在伸民权、争国权、振兴中华等根本问题上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在具体采用那些变革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发展的手段与措施上,却难有一致的主张。其中,既有属于认识层次上的原因,又掺杂着宗派思想、门户之见诸因素。这些因素深刻影响了各派力量的团结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外交活动的开展。

20世纪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不能将眼光仅仅停留在取得了多少实质性外交成果上,而是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内探寻其历史作用与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外交的兴起,必须要有众多具有现代国民思想的民众来参与;国民外交的开展,必须要有一批懂得国际法律知识的民众领袖来组织;国民外交的成果,必须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采用必要的外交手段才能获得。因此,作为启动阶段的国民外交活动,是不可能立即取得令人满意的外交成果的,而主要是为今后国民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做些奠基性的工作。据此,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普及了国际法律知识,增强了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正如时论所言,“国家之原素,实惟国民与国土而已。当总揽国权者不能保民而王,且屡失可宝可贵之土地,则保存国土之责,舍国民其奚属乎?”^[3](第823页)“抵货以废约为第一目的,而以发起国民爱国同胞抵外力之感情为第二目的”,抵货是为了“挽回利权,争成人格,外人不致轻视我”,是为了“振起国魂,挽回国势”。当时各种国民外交活动的开展,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引导着中国民众要以国民资格来争国权、保国土,而且在各种实际的对外交涉交流活动中,激发着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国民意识,并由此推动了各种相关的国际法律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也正是在对外交涉交流的实践中,中国商界才认识到依据国际通行的法则来争国权、保商利的重要性,从而自主发起召开了1907年的第一次全

国商法大会,以图改变“外国商人有法律,中国商人无法律”的状态,通过健全本国的法律法规,来确立自身在国家中的地位,在涉外商事纠纷中,能切实维护中国商界的利益。这些均表明,近代中国民众国民思想的产生、确立、增强,并逐渐走向成熟,是与其对外交涉交往的步伐基本一致的。

其次,是进一步推动了各类民间团体的成立,为此后形成各界联合的国民外交组织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初各派力量组织开展的各种对外交涉交流活动,大多是以各种团体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而这些团体组织在活动中所显示出的组织优势与规模效应,又推动了各领域各类型团体组织的成立。民国建立后,各种专业性的民间团体便纷纷出现,仅1912年成立的各种实业团体就有几十个,诸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拓殖协会……。而且,各种中外合作的国际性的民间组织也随之出现,如中美国民同盟会、中英美睦谊会、中日国民协会、中日新闻记者俱乐部总会……。这些社团组织的纷纷涌现,不仅使民众的参与面大为扩展,对外交涉交流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而且也最终形成各界联合的全国性的国民外交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是进一步拓宽了民间对外交涉交流的渠道,形成了更为广泛的海内外联系网络。20世纪初革命派、保皇派在海外建立的各种机构,不仅广泛联结了海外的留学生、华侨和各国友好人士,编织起一个遍布各国的海外联系网络,而且直接沟通了海内外的各种联系,疏通了中外民间交往的各种渠道。中国的商会组织也已通过各种对外活动,广泛联结海外各国的华商组织,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华商联系网络,而且与各外国商会、实业团体、展览中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了世界经济网络中的一员。这些对外交流渠道的拓展与联系网络的建立,无疑为民国时期的中外民间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列强各国的对华政策。20世纪初中国各派力量在海内外开展的各种国民外交活动,不仅逼迫清政府出台了某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从而加大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外商约谈判、中美《华工禁约》交涉和借款筑路交涉之结果。如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最终迫使美国政府作出了一定承诺,并撤换了商务和劳工部长,移民局也出台了缓解国内排华气氛的新规则^[13](第94页)。在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英国方面最终没有能使1908年3月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正式生效,沪杭甬铁路由中国民间集股修筑而成。因此,20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外交努力,尽管未能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能根本改变“利权尽在洋商之手”的局面,但毕竟已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影响、制约政府决策的作用。

总的来说,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虽然还刚处在全面启动阶段,但其在激发中国民众的国民参与意识,培养中国民众的现代组织观念,增进中国民众的国际法律知识,启发中国民众如何在对外交往中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与自身权益,以及如何向世界宣示中国民众的觉悟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等方面,已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时论所言: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是我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也“使我国民之资格、之位置益见重于世界”^[16](第20号)。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毕竟揭开了新世纪中国外交新的一页。

[参 考 文 献]

- [1] 吴方. 张元济传[M]. 上海: 文艺出版社, 1994.
- [2] 王忍之,等.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 [3] 王忍之,等.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 [4]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5] 陈锡祺.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6] 王忍之,等.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 [7] 方雄普. 海外中华总商会的由来[J]. 海内与海外, 1998(8).
- [8] [美]史扶邻.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9]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康有为与保皇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11]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12] 徐鼎新, 钱小明. 上海总商会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13]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2 卷[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 [14] 美国实业团来华续记[J]. 东方杂志, 1910, 07(10).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十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6] 饮 冰. 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J]. 新民丛报, 1905, (20).
- [17] 蔡元培. 外交报叙例[N]. 外交报, 1902-01-04.
- [18] 曾 铸. 留别天下同胞书[N]. 新闻报, 1905-08-24.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Chinese Civil Diplomacy Early in 20th Century

GU Ying-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Jiangsu, China)

Biography: GU Ying-hui (1953-), fe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Suzhou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foreign relations.

Abstract: Civil Diplomacy comes from the concept of people's sovereign, is that the people carry on foreign negotiate and exchange in unofficial status for defending the state sovereign, its rights, development and world peace. The rise of Chinese civil diplomacy early in 20th century was the result of Chinese history development in that certain period, which was of many characteristics and of many special historic functions.

Key words: Early in 20th Century; China; national diplomacy